

钱 竞 著

近思集

學苑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近思集

肇庆分校编

学苑丛谈

近思集

钱 竞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思集/钱竟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9

(学苑丛谈/王学泰主编)

ISBN 7-80060-639-2

I. 近… II. 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3850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永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8.875 印张 168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定价:16.00 元

《学苑丛谈》序

王学泰

这套随笔丛书是用出版社的名字命名的,这种流行于海外出版社的编辑方式,在大陆还很少有出版社运用。学苑出版社的这次尝试,说不定还是大陆出版界首创呢^①!我想不是别的出版社没有想到这一招儿,而是大多数出版社的名字限制了它们不能这样做。过去大多数出版社都是用所在省、直辖市的名字^②,或是主管机关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如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建筑、财经之类,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命名的。用这样的名字命名文艺、人文、社科之类的书系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按说中国是个非常重视名字的国家,孔子就说过“名不正,言不顺”。自古以来为了起个好听的名字许多人是费尽心

① 因为没有调查,不好说死。

② “文革”中每个省大体上也就一个出版社,称“某某人民出版社”。多一点的,至多加上个分类的修饰,称“某某美术出版社”、“某某教育出版社”、“某某科技出版社”而已。

思的。有权势地位的,或有经济力量的自不必说,就是我家乡没有文化的贫苦百姓也有对好名字的追求。听父亲说过,六七十年前,每家生了男孩子都要郑重地为他命名。没有文化的穷人家也要花上一块大洋请乡村的教师^①为他起个非常雅气的名字和同样典雅的表德^②。如希望长寿的,名修龄,字彭年;希图富贵的,名廷璧,字蕴辉等等。这些有了美名的穷人们,可能一辈子只用两次,一次是写在家谱上,一次是死后写在神主牌位上,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是“猪娃儿”、“狗蛋儿”——人们仍用他们的小名称呼他们,到老了,也是“猪娃儿伯”、“狗蛋儿爷”。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并不因为没有用而改变他们对于名字的重视。这不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反映了他们对文化的追求。

近几十年来,民间这种对“文”的追求的传统被忽视了,事事皆归于“朴素”,人人以粗鄙为美,以无文为荣。不仅老百姓不讲“文”了,就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也不追逐文采了。记得1958年“反右”之后又把王实味、丁玲、萧军四十年代在延安写的杂文如《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发表出来“再批判”。这些被称为“大毒草”的文章登在改版的《文艺报》上,并由该报编辑部写了一个“按语”以表达编辑部的态度。当这个“按语”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在上面用粗重的红铅笔批了四个大字

① 在那时,农村教师几乎是当地所有有关文化事宜的顾问。

② 也就是通常说的“字”。

“文人无文”^①，批评“按语”写得没有文采，他另代写了一篇“有文”的。毛批评是对的，“无文”、粗俗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何必单单批评文人呢！一人有文，万人无文，“无文”的最坏结果，不过是极偶然地被毛批评一次；而追求文采，它可能招致的最轻批评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严重一点，就会被人们发现追求文采背后还有某种“反动的政治企图”，可知文化界的“无文”，并非文人都是白吃干饭的、根本不懂“文”，而是有意地在躲避“文”。因此，以传播文化为职责的出版社没有给自己起个有点文采的名字也是不奇怪的，谁愿意为个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名字去招惹是非呢？

二十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和政治上的宽松，重新唤起人们文化意识和对文采的追求，甚至在某些领域这些追求都显得有点过份和变态。出版社的增多和命名上的讲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现在出版社增加到五百六十余家，其名字也不局限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方面，文化单位开始有“文”了。学苑出版社就是在呼唤文化的高潮中涌现的一个新型的出版社，它为自己起了一个富于文采和与本社服务对象相称的名字。苏轼有诗云：“笔砚耕学苑，戈矛战天骄。”它形象地表现了“学苑”是文人们的聚会和向学之所，用它来命名我们这套随笔和杂谈丛书是名实相副和十分恰切的。我们欢迎更多的从事学术研究和一切对于文化有兴趣的人们进入“学苑”，分享耕耘与收获的愉快。

① 我看过原件的影印件。

随着学苑出版社的成长与发展,希望这套丛书也能连绵不断,继续编纂下去。我想书系也像攀登高峰的登山队一样,腰间要系一根绳索,以免在攀援中迷失。出版社也是如此,在书籍的瀚海中,把题目或体裁类似的作品串作一系,不是分外醒目而令人关注吗?

最后,我们要感谢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为这套书题写了书名。

1999年7月

自序

一转眼,过了天命之年,直奔“耳顺”了。青年时代,是在“三年困难”、“四清”、“文革”中耗过去了。确实,就是这个词儿——“耗”。也找书读,也想些事儿,但是不可能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更不要说做学问了。

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算是走上了学术道路,但是说心里话,当时觉得自己明白,其实还是糊涂。不论是美学界内的论争,还是文学界内的冲突,在80年代,都透着浓烈的斗争精神。哪一头都盼着争出个是非高下,都强烈希望自己这一方得到合法的正统地位。

不过,在当时,对那些自己有意或是无意而卷入的论战,心里并不舒服,我个人非常不乐意以学界为战场,然而不幸的是,闹到最后,人们果真亲身经历了战场。紧接下来的,是改变了形式的战争——商战。90年代的最大特色,是人人想赚钱,想发财。于是,种种能够想到的和没法想象的事情都出来了:寻租、大款、三陪、吸毒、爱滋病。在经济快速增长中,伴随的几乎是社会全方位的腐败滋生。

说来也怪,偏偏是在这么千奇百怪的时刻,自己的头脑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冷静,也更加清楚自己的主业只能是治学,不是经商,更不是从政。

我想,也许后人会问起: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又在干什么?

我想到的回答是:尽可能运用已经和正在积累的知识,认真地思考;在一切涉及到公共事务的领域里,酝酿和发表自己的独立的意见。

手头上结成的这个文集,或多或少表现出这种独立思考和写作的意图。这本书大体上划分出三个板块:

其一,偏重于思想。按理说,作为一个以美学为专业的研究者,是以西方美学为主要资源的,但我感到,在美学、文学理论方面,中国文化资源是严重地被忽视了。即使是面对中国美学或文论的著述,也不自觉地依从着西方的范式来解读中国的文本,而且,常常把“体系性”之类当作最重要的价值尺度,这往往低估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大约在80年代后期,我就转变了研究方向,更多地接触和体会中国人的思想和著述。所以,这部分文章,主要反映的是这样的研究兴趣:前边是先秦时期,后边是近现代,尤其注重在晚清时期再度高涨且对百年中国有极大影响的“经世学”主潮。我很清楚,在今天,在很多人谈“跨世纪”的时候,经世致用的冲动仍然占着上风,没有多少人肯真正赞同“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其实,强调独立和自由的学术工作反而因此显得特别可贵。一窝蜂地去做政策研究,提对策建议,尽管有它的必要性和实用性,但是我

要问,这一切政策和对策难道是空中楼阁?难道不应当思考它们的学理基础吗?我们太热衷于做高层建筑,不大关心基础是否足够的牢靠。

其二,偏重于人物。可能我遵循的,还是前人“知人论世”的原则。我自己的秉性使我不喜欢语言逻辑的游戏,厌烦纯粹思辨的艰苦工作。说实话,像康德的三大批判那样的著作,就是用枪顶在我脑门上,我也会拒绝去写。因此,我对思想史的兴趣,常常为思想者的经历遭遇所牵动。不去读传记,读年谱,读日记,读家书或其他类信函,是没有办法让前人在我的头脑中活跃起来的,而如果不是一个活人,不是活泼泼地有其喜怒哀乐的人,我也就无法理解其行为与心理,就谈不上什么思想研究。对陆陇其这样生前萧条,死后显赫的大儒,不仅要体会他的辛酸,还要看到当时社会权力结构的残酷,在这种背景下才能更深入地理解程朱派学者的悲喜剧。其他一些人物,如王闿运、杨度、顾准,也都是一些堪称“独立特行”的著名者,对他们的深入剖析而不是简单的揄扬,能够领会到人生中许多深刻之处。需要提一句的,是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名声大噪的索罗斯。很多人知道他在金融领域擅长投机,然而对于什么样的时势能够造出索罗斯这样的角色却不甚了了。我自己以为,在今天中国许多学者大谈“全球化”、“自由化”的时候,需要严肃地想一想究竟“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全球化”的主体是谁?“全球化”打着的是什么样的印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谁是真正的赢家,谁是地道的输家?在索罗斯的背后,有一条学理统绪的线索——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

密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线索。也许应该加一句的是,全球化并非自今日始,或许可以说,但凡有帝国存在,就必有全球化的冲动。帝国传统和全球化是不可分的,而这种传统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这人类历史上最凶险、最残酷的两百年!

其三,偏重于趣味。正如学泰兄所说的:“学术研究脱下艰涩的外衣是不是读者会多一点。”对于号称高深的美学,我向来希望它能从专家的手里解放出来,让更多的人明白美学的道理,增强我们的理解能力甚至是感悟能力。在这部分篇章中,我是努力这样做的,应该适合有大学程度的读者。而且,此前未曾出版过的这一组文章,也算是了却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对占去了自己十几年的美学生涯,多少算是个交代。

在笔耕者中,我不是勤奋的。然而下笔之时也力图发前人之所未发,不敢说有多少新意,却也尽量避免陈言。

能不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哪怕是一点反馈呢?我真诚的期待着。

钱 竞

1998年8月1日

目 录

自序	(1)
孔子与原儒	(1)
“吾与点也”的审美理想	(10)
曾国藩、王夫之的文论统绪	(22)
王国维的三件工作	(45)
青年毛泽东的学与文	(68)
议“经世致用”	(92)
看“河东河西”	(95)
在语言悖论面前	(98)
病态与常态	(105)
陆陇其的悲喜剧	(109)

胡雪岩其人·····	(118)
薛福成的外交·····	(122)
王闿运、杨度与湘学·····	(127)
争论使人想起顾准·····	(143)
全球化中的奇异景观:索罗斯现象·····	(150)
原始石器与形式感·····	(160)
洞穴壁画的意味·····	(166)
快感的“移位”·····	(173)
仁者乐山·····	(178)
从无心到有意·····	(186)
喜剧的超越·····	(192)
愉快的告别·····	(202)

电影观众的欲望·····	(212)
中国电影文化的特征·····	(231)
附录:《北戴河对话录》摘要 ·····	(251)

孔子与原儒

说到儒家，一般人立刻会想到孔子，甚至认为他是儒家的创始人。今天，山东曲阜的孔府早已整旧如新，孔子的后代依然健在，凡汉族聚居之地到处都曾设立的孔庙，似乎都在为上述说法提供着证据。然而，这确是一个误会，事实并非如此。

儒的历史可比孔子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七十多年前，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有一篇论文叫《原儒》，就是要正本清源，说明儒的不同含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儒就是术士，就是原始信仰时代的巫师。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儒来源于“需”字。“需”作为象形文字的含义是云上于天。儒字从需，正是借需的本义指称儒的身份，表明儒是知天文、识旱涝的人，是能够通天达地的特殊人物。在相对狭窄的意义上，儒又是掌握了专门技艺即“六艺”的人，熟悉“礼、乐、射、御、书、数”，是担负着统治职能或协助统治的社会集团。在更窄的范围里，儒才专指儒生。《汉书·艺文志》上记载说：

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于六经

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这里描绘的，才是以孔子为开山祖的儒家，形成了系统学术思想的儒家。章太炎先生从古代文献的考据整理中发掘出“儒”字的多层含义，使人们从后代统治者制造的孔子神话中看到了儒在变化发展中的真相，这是一项贡献。

在最近几十年里，凭借殷商时期出土文物的积累而发达的考古学，又为儒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强有力的新证据。

人们知道，《论语·先进》中有孔子的一段话，说：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这就出现了一段疑案。为什么孔子谈到在礼乐文化上先进的，不是君子反而是野人？为什么孔子表明自己的心迹是追随先进亦即追随野人？对这一段儒学经典，宋明时期的大儒如程朱陆王向来是讲不清楚的。到了今天，我们根据殷墟甲骨文字和文物研究的结果则可以知道，殷商民族的文化要比取代它的周民族开发达得多，在礼乐文化方面处于先进地位。到武王伐纣后，周民族成为中原地带的新统治者，才自居为“君子”，而先前处于统治位置的殷人在政治上失势，被迫迁徙到当时的边远未开之地，才被称为“野人”。孔子这段话，虽然简短，但修辞上却很委婉：如果要用礼乐，我当然要继续先